专题：聚焦日本与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恶化的历史背景与症结所在

归泳涛　黄楚云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在友好与摩擦之间起伏波动，总体上趋向恶化。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民意崛起引起的两国国内决策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崛起引起的亚太国际格局的变化。这两种结构性的变化使得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上升为战略上的竞争和对立。中日之间要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当务之急是冷静、理性地认识上述变化，并从长远利益出发处理国内、国际层次上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中日关系　民意崛起　美国因素　对日政策

近年来，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明显恶化，甚至出现了军事竞争的危险。两国民间的相互印象也跌至低谷，媒体和网络上各种过激的言论泛滥。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两国国内存在种种情绪化、道德化的论断，相比之下，客观、理性的声音仍不够有力。中日关系的恶化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哪些因素是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症结所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当前和未来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本文首先回顾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起伏与恶化的历史背景，进而从国内和国际层面探讨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最后就中国如何全面、理性地认识和处理对日关系提出几点初步的思考。

1 归泳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黄楚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1级本科生。

本文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受日本笹川和平财团委托实施的研究项目“中日关系恶化的历史背景与症结所在”的部分成果。课题组负责人归泳涛，成员有黄楚云、王旻、田琳、王敏钊、黄伟晶、储懿、姚晨钰、周玫琳、李卓尔、梁晓璇、毛若冰、陈丹梅等。

一、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起伏与恶化的历史轨迹

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在友好与摩擦、冷却与回暖之间起伏波动。一方面，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分歧和不信任日益加深，甚至出现了对抗的趋势；另一方面，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持续增长，民间交流日益密切。但总体来说，中日关系在这20多年里趋向恶化。这一恶化的过程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迄今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拐点：1996年、2005年和2010年。1996年的台湾海峡危机暴露了中日在安全领域的结构性矛盾，与此同时，历史认识问题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位置开始上升，“中国威胁论”也在日本的精英和民众中蔓延开来。[1] 2005年，中国爆发大规模涉日游行，民意对中日关系的冲击突显出来。2010年，中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撞船事件，正值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力对比的变化使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上升为战略性的竞争和对抗。以下对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进行分阶段的梳理，以期勾勒中日关系起伏与恶化的基本线索。

（一）1992—1996年：从友好到摩擦

1992年是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是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10月日本天皇访华，中日关系达到一个高潮。在友好的氛围下，中日之间的经贸、文化及民间交流也得到良好的发展。然而，1993年之后中日围绕台湾问题、历史认识以及日美同盟强化等问题产生一系列分歧和摩擦，特别是在1995年至1996年期间出现了关系冷却的局面。

在台湾问题上，1993年2月日本允许台湾“外交部长”钱复访日，1994年9月，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赴日出席广岛亚运会，引起中方的不满和抗议。在历史问题上，尽管村山富市首相在1995年发表了关于战后50年的谈话，对日本的侵略历史表示了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但由于一部分自民党议员的阻挠，日本国会通过的战后50年决议没能对侵略战争进行真诚的反省。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受到中方批评。另外，这一时期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也引人注目。1994年，日本政府内阁成员永野茂门、樱井新发表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言论。1995年，一部分国会议员参与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否认侵略罪行。1996年，企图歪曲日本侵略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立。中日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蒙上了阴影。

与此同时，中国核试验和台湾海峡危机引起了日本的戒心。1995年5月和8

1 本文提及的中日舆论调查及其所反映的中日相互认识的变化，均参阅李玉：《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中日相互认识的变化》，《亚太研究论丛》第九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页。

月，中国进行两次核试验，日本政府表示抗议并冻结了对华无偿资金援助。1996年3月到4月期间，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日本首相公开表示了担忧。日本民间的对华印象也出现转变。日本政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显示，自1978年该调查开始以来，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国民在1996年第一次少于没有亲近感的。

这一时期中日矛盾的加剧还与美国的东亚政策相连。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日，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就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事项达成协议。中方批评这一举动是冷战思维的残留，并要求确认“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此外，日本右翼分子自1996年7月起连续登上钓鱼岛并修建灯塔，引发了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抗议。[1]

总的来说，中日关系在这一时期从高潮跌落，政治摩擦日渐增加；但另一方面，两国经贸关系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中日之间出现了第一次“政冷经热”的局面。[2] 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到1996年期间的台湾海峡危机虽然源于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但暴露出冷战后中日（或者说中国与日美同盟）在东亚安全领域的结构性矛盾。

（二）1997—2000年：关系回暖与战略认识的差异

1997年至2000年，中日实现了首脑互访，两国关系出现回暖的迹象，但双方在日美同盟、台湾问题、历史认识以及钓鱼岛问题上的裂痕没有弥合，甚至更加明显了。

1996年10月，中国宣布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停止了核试验。作为回应，日本政府在1997年2月决定重启对华无偿援助。1997年9月，桥本龙太郎首相访华，期间参观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成为二战后首位访问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首相。1997年11月，李鹏总理访日，中日缔结了新渔业协定。1998年2月，迟浩田访日，实现了中国国防部长对日本的首次正式访问。同年5月，日本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访华，双方就促进防卫交流达成了一系列协议。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中日关系中具有重要历

---

1 [日]毛里和子：《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徐显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124页。

2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在研讨会上开始使用“政冷经热”这一概念。如金熙德接受《中国大学生》杂志采访时指出：“70年代中日建交后，在‘和平友好’外交政策支配下，双方处于友好和合作时期。但现今中日关系出现了新情况，突出表现为‘政冷经热’和‘互相猜疑’。”（《中日青年相互了解吗？》，《中国大学生》，1997年第9期，第32页）；关于“政冷经热”的研究成果，参见金熙德：《中日关系——复交30周年的思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金熙德：《中日“政冷经热”现象探析》，《日本学刊》，2004年第5期；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史意义的第三个政治文件。在此背景下，中日关系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势头，高层互访得到延续，经贸合作和民间交流迅速发展。1999年，中日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这是最先公布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入世协议。[1] 1999年7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华。2000年10月，中国总理朱镕基访日。

虽然中日关系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回暖迹象，但双方的分歧和不信任也日渐明显。1997年7月，日美确定了防卫合作新指针，事实上将台湾纳入了日美安保的范围。中国认为这是日美同盟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强烈抗议。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中方对日方不愿在《联合宣言》中写明对侵略历史的道歉感到不满；而日本政府和民间则对在历史问题上被反复要求道歉产生了厌倦情绪，甚至有人怀疑中国在打“历史牌”。[2] 此外，1997年，日本议员西村真悟登上钓鱼岛；1998年，否定东京审判的电影《自尊》在日本公映；2000年，“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教科书通过日本文部省的审定。中日在社会层面上的相互认识和感情受到负面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日双方都致力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但两国背后的战略设想并不一致，主要表现在两国对冷战后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不同认识上：中国认为国际秩序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日本则倾向于维护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以日美同盟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秩序。[3]

（三）2001—2006年：关系恶化与民意的影响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在其任期内中日政治关系和国民感情显著恶化，最直接的原因是小泉连续六年参拜靖国神社。2005年4月，中国民众在历史问题上积累的愤懑终于爆发，多座城市发生了以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反对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等为口号的示威游行。游行画面经由媒体传到日本，引起舆论震荡。民意调查显示，双方的相互印象跌至历史新低。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恶化还体现在，多个长期困扰双边关系的问题同时爆发。2001年4月，日本允许李登辉以治病为名访日，加深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日本的不信任。中方强烈抗议，冻结了高层往来，取消了中国军舰访日和双边安全对话。2005年2月，日美“2+2”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将台湾问题列入“共同战略目标”，引起中方强烈反对。中日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也时有摩擦。但需要指出的是，自2004年起两国开展了多轮东海磋商，为

1 [日]益尾知佐子：「二国間実務協力と東アジア地域協力の進展　一九九九－〇〇年」，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1972—2012　Ⅰ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349頁。

2 [日]天儿慧：《新世纪日中关系新思维的建构》，《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8期。

3 [日]江口伸吾：「橋本首相のユーラシア外交と江沢民主席の来日　一九九七－九八年」，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1972—2012　Ⅰ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323頁。

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创立了建设性的机制。

在政治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一些偶然事件也加剧了中日之间的负面情绪。例如，2002年发生的沈阳领事馆事件经由日本媒体和政客的炒作，造成了中国在日本舆论中的负面形象；2003年发生的齐齐哈尔化学毒剂事件再次刺激了历史问题的神经，增加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在中国举办，期间一部分中国球迷的过激言行引起了日本民间对中国的负面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到2003年期间，中国国内一度出现“对日新思维”的声音，主张中日合作，反对诉诸民族主义情绪。但在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的背景下，这样的主张不仅没有得到日方的积极回应，而且在中国国内也受到很多批评。

与政治关系的恶化相比，中日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在这一时期仍然快速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对外开放，日本经济在“中国特需”的刺激下受惠颇多，中国也在2002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日关系出现了第二次“政冷经热”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以2005年中国民众的抗议示威为标志，民意对中国对日政策的影响变得显著起来。同时，随着自民党内右派势力的崛起，日本精英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也明显增强了。

（四）2006—2009年：再度回暖及潜在的不稳定

中日关系在经历了五年半的低谷期后，于2006年迎来转折点。小泉执政后期，日本国内舆论以及执政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重新思考对华政策的声音。2006年9月，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很快于10月实现访华。这次访问打破了两国关系多年的僵局，被称为“破冰之旅”。访问期间，中日同意构筑战略互惠关系。此后，中日领导人互访得以继续。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2007年12月福田康夫首相的“迎春之旅”和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都给两国关系带来正面的影响。胡锦涛访日期间，签署了中日关系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领导人互访带动了双方关系在经贸、防务、文化等领域的发展。

2008年5月，中国汶川地震发生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当即发来慰问电，并派遣救援队赴四川，成为中国政府接受的第一支外国救援队。6月，中日双方宣布两国通过平等协商，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2009年鸠山由纪夫出任日本首相后，重视亚洲外交，采取了对华友好的政策。2010年，温家宝总理访日，双方同意正式启动落实东海问题原则共识的谈判。

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总体趋向改善，但仍存在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中日达成的合作开发东海资源的共识一直没能付诸实施。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任首相期间提出的“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日美澳印联盟”等外交理念和设想隐含制约中国的意图，引起中方的警惕。此外，一些偶然事件也导致中日

间的摩擦。特别是2007年底到2008年初发生的“毒饺子”事件，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虽然当时中国民众的对日好感度表现出上升趋势，但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却因为这一事件下降，反映出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更加复杂多样。

（五）2010年至今：对抗

随着2010年鸠山由纪夫首相的下台，民主党政府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回到了自民党时代的路线。日本国内政治也在朝野对立和执政党内斗的压力下摇摆不定。2010年9月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生了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与中国渔船相撞的事件，日本政府抓扣中国船长并准备依据国内法处理，引起中日一连串外交折冲。事件在中国再次引发示威游行，在日本国内则因政治利用和媒体关注持续升温。受此事件影响，日本在外交上明显倒向美国，因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陷入僵局的日美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可以说，从2010年开始，钓鱼岛问题取代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最突出的障碍。这一年正值中国 GDP 超过日本，实力对比的变化改变了两国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使领土问题上的分歧上升为战略性的竞争。

撞船事件后中日关系再度冷却，直到2011年3月11日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双边关系在救援外交的推动下出现转机。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了救援队，中国媒体进行了大量正面的报道，中国民众对日本国民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镇定、团结和秩序感到敬佩。3月18日，胡锦涛主席到日本驻华大使馆吊唁；5月21日，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灾区。《人民日报》等多家中国媒体刊登了菅直人首相的感谢信。

然而，这种良性互动对中日关系的推动作用和持续时间都十分有限，双方围绕钓鱼岛问题的对立仍在不断加深。2012年1月日本政府决定对包括钓鱼岛附属岛屿在内的39个未命名岛屿实施命名，中方随之采取了回应措施。2012年4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开始大肆炒作“购买”钓鱼岛的计划；7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了由国家“购买”的意向；9月11日，日本政府签订合约对钓鱼岛及其三个附属岛屿实施“国有化”。中国政府随即采取了一系列强烈的反制措施，包括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以及派遣海监船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海域实施常态化巡航。中国民间的示威游行蔓延到数十个城市，其中还出现了暴力现象。中日国民之间的相互厌恶情绪由此达到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采取的政策是对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基于美日安保条约对日本负有防卫义务，且认为钓鱼岛在日本的管辖之下，因而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

2012年底，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胜，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上台后便诉诸民族主义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对抗更加激烈，出现了军事竞争的危险，民间甚至开始担忧中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2013

年11月，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钓鱼岛包括在内，日方强烈反对，要求中国撤销。12月，安倍在执政一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不仅激起中、韩强烈反对，而且引起美国的不满。此后，中日投入前所未有的国际舆论战，双边关系更趋紧张。

二、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

从以上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冷战结束以来的中日关系尽管在经贸等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总体上陷入转圜艰难、持续恶化的困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日关系的恶化呢？迄今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日本防卫体制和防卫力量的转型以及日美同盟的强化，造成了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二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认为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恩怨纠葛，加深了相互间的隔阂和疑惧；[1] 三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中国的民族主义等因素是导致关系恶化的主因；[2] 四是认为两国决策体制的差异和变化造成了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迟延、误解和误判；[3] 五是认为两国在若干具体问题上的互动及其结果，逐渐积累和加剧了相互间的戒备和不信任。[4] 六是归咎于美国的介入，认为美国为了追求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故意在中日之间制造和利用矛盾。[5]

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层面上的结构性变化，即民意崛起引起的两国国内决策环境变化和中国崛起引起的亚太国际格局变化。

上述解释各自指出了问题的不同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笔者认为，中日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上的结构性变化，即民意崛起引起的两国国内

1 有关地缘政治和历史认识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参见 Kent E. Calder, "China and Japan's Simmering Rivalr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Issue 2, Mar/Apr 2006, pp.129-139; He Yinan, "Ripe for Cooperation or Rivalry? Commerce, Realpolitik, and War Memory in Contemporar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sian Security*, Vol. 4, Issue 2, May 2008, pp.162-197。

2 有关民族主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参见Peter Hays Gries, "Nationalism, Indignation, and China's Japan Policy," *The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5, No. 2, Summer-Fall 2005, pp. 105-114; Eugene A. Matthews, "Japan's New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Vol. 82, Issue 6, Nov/Dec 2003, pp.74-90。

3 有关决策体制差异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参见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Dangerous Waters: China-Japan Relations on the Rocks, " Asia Report, No. 245, 8 April 2013, http://www.crisisgroup.org/en/regions/asia/north-east-asia/china/245-dangerous-waters-china-japan-relations-on-the-rocks.aspx，2014-4-5。

4 有关中日在具体问题上的互动及其造成的战略互疑，参见 Richard C. Bush, "China-Japan Tension, 1995-2006: Why They Happened, What to Do," Policy Paper, No. 16, June 2009, Brookings Institute,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09/06/china-japan-bush，2014-4-5。

5 有关美国在中日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参见郑永年：《民族主义与中日关系的未来》，联合早报网，2012年10月2日，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21002-56787，2014年4月5日登录。

决策环境变化和中国崛起引起的亚太国际格局变化；在这两种结构性变化的背景下，中日相互认知出现了情绪化和两极化的趋势，[1] 导致两国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从国内层面看，民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处在上升和不稳定的时期。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日关系主要是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维持和推进的。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和解”、在领土问题上的“搁置争议”都主要依靠政府层面的理性和克制得以实现。在这段时间里，两国的精英基本上维持了对日或对华政策上的共识，而且得到民众的支持；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也还处在相对单纯的阶段，很大程度上受到主流意见的引导。这种政府主导的中日关系模式在冷战结束后受到严重的挑战。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带来了利益和价值观的多元化，舆论迅速上升为影响决策的一股重要力量。一部分人在大国心态的驱使下把政府具有灵活性的外交政策指责为过于软弱或不作为，面对外交问题不满足于口头上的抗议，而是要求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他国就范，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中国外交的成功。基辛格把这样的思维和情绪称为“必胜主义”，指出此类主张虽没有得到政府的首肯，但“说出了许多当前思潮的潜台词”。[2] 这种思潮表现在对日关系上，就是认为中国的实力正在超越日本，而且未来中国将更加强大、日本将更加衰弱，因此中国在与日本的争端中无需妥协，日本最终会认识到自身实力不足而改弦更张。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在大众中广泛存在，而且影响到一部分精英的世界观和对日观，甚至还蔓延到了学术界。据一位中国学者观察，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国力日增，在学术研讨中也日益明显地出现了情绪化的苗头。[3]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近代深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经过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才最终赢得国家独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正义性毋庸置疑。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中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应看到其背后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不能一概否定。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常常对外交和国际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上述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也许符合相当一部分人的情感取向，却不是建立在对亚太国际格局和日本国内情况的客观分析之上。此类主张经由媒体、网络放大和扩散，使得围绕中日关系的讨论越来越情绪化。

与情绪化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中国对日政策争论中的两极化趋势，表现为“友好论”与“敌对论”之间的对立。长期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历史认识延续了把绝大多数日本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的两分法。与之相对应，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认识，也包含了对和平友好的珍视和对日本右倾保守势力的警惕两个

1 有关中日关系讨论中出现的情绪化和两极化倾向，本文受益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玉教授的指教。

2 [美]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496、509页。

3 杨奎松：《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爱思想网，2010年4月22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3171.html，2014年4月6日登录。

方面。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日方的言行要么被视为对华友好，要么被看作对华敌视。这种简单的两分法使中国人的对日认识更多地基于道德和情感，而非事实和理性。在实践中，这种两极化的倾向不仅导致人们对合作的过度期待[1]和对摩擦的过度解读，而且阻碍了共识的形成和政策的灵活运用，既使得处理分歧的政策趋于僵硬和简单化，也使得友好合作的政策因缺乏广泛支持而难以实现。

在日本，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自民党一党独大的“55年体制”于1993年终结。在经济停滞和政治丑闻的冲击下，政府和政党的权威一落千丈，无党派选民大幅增加，政治家日益迎合大众。与此同时，自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主导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经世会系[2]在21世纪初失去了党内主流派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清和会系，[3]后者总体上亲美反华，是保守阵营中的右派。特别是小泉纯一郎在其执政时期着力摧毁经世会系的力量，并打破官僚对外交决策的主导权，其结果是：日本决策层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不复存在，中日之间达成的一系列默契难以为继。[4]而安倍晋三的崛起标志着新一代政治精英开始主导日本政坛，有学者称之为“平成世代”。[5]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出生于20世纪60和70年代，90年代后开始在政坛上崭露头角。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和战后初期的艰苦岁月，对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罪行缺乏认知、愧疚和反思，甚至有人企图通过美化侵略历史重振民族自信心。他们还把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在经济上的成功视为当然，延续了近代日本对亚洲邻国的优越感和轻视。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他们试图摆脱战后和平主义的束缚，把日本变成能够从事战争的“正常国家”，以获得想象中的国家尊严和国际地位。

尽管新一代日本政治精英也有相对开放、务实的一面，各自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就目前来看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日本保守政治的传统，而且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对华政策上，一部分政客利用“中国威胁论”煽动民众情绪，希图通过右倾化实现政界重组，强化政治权力。对此，约瑟夫·奈（Joseph Nye）称之为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他指出这样的做法在国内能捞取选票，在国外却会引起与邻国的敌对。[6]

总之，民意的崛起打破了迄今由政府主导的中日关系模式。尽管民意影响外

1 邱静：《“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中日比较的视角》，《外交评论》，2012年第1期，第110页。

2 经世会系主要政治家有田中角荣、竹下登、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额贺福志郎等。

3 清和会系主要政治家有岸信介、佐藤荣作、福田赳夫、森喜朗、小泉纯一郎、福田康夫、安倍晋三、町村信孝等。

4 有关经世会系和官僚在对华政策上影响力的衰落，本文作者得益于日本防卫研究所杉浦康之先生的指教。

5 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pp. 355-362.

6 Joseph Nye, "Japan's Nationalism is a Sign of Weakness," *The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7, 2012, http://www.ft.com/cms/s/0/c6b307ae-3890-11e2-981c-00144feabdc0.html#ixzz2EFAw1b37, 2014-4-6.

交决策的方式在中日两国有很大不同，但大众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民粹主义政治在日本的泛滥改变了以往那种由想法接近的政治精英主导外交决策的情况。而民意是多变和多样的，自然会给国家间关系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从国际层面看，中国崛起和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趋势意味着两国在对外政策上都表现得日益自信和进取，但两国外交又都处于过渡期，包含着不可预测性，这增加了中日之间的猜疑和竞争意识。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海峡危机和近年来的钓鱼岛危机正是这种结构性矛盾的体现。前者虽然主要涉及中美关系，但已暴露出中国与日美同盟之间的战略矛盾；后者则是中日之间围绕主权、领土和战略地位的直接对立。

美国的政策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因素，但美国在中日关系的不同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东亚政策是通过强化美日同盟，应对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维护冷战后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日本被纳入美国的这一战略，但不愿被卷入与中国的冲突。近年来，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美日同盟和驻日美军基地的重要性再次突显出来，但美国对日本的政治右倾化也有所警惕，担心日本的挑衅行为会激化地区紧张局势。与台海危机时不同，在钓鱼岛问题上，是美国不愿被卷入日本与中国的冲突。在历史问题上，美国长期以来的做法是不表态、不介入，不愿意让历史问题影响美国的安全利益。但是，在东北亚局势因朝核问题、领土问题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挑衅言行损害了美国维护地区稳定的政策目标，因而引起美国的介入和制约。总的来说，美国有其自身的利益，对中日之间的矛盾，有时利用，有时抑制，其作用混合了激化矛盾和暂时稳定局势两个方面。对中国或日本来说，希望把美国拉到自己一边从而逼迫对方就范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美国有其自身的利益，对中日之间的矛盾，有时利用，有时抑制，其作用混合了激化矛盾和暂时稳定局势两个方面。对中国或日本来说，希望把美国拉到自己一边从而逼迫对方就范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国内社会和亚太国际格局都处在过渡时期，这增加了政治和外交上的不确定性。而政策讨论中的情绪化和两极化又挤压了人们的话语空间和思维空间，不利于两国形成全面、平衡的看法。这是中日关系恶化在客观上和主观上的症结所在。

三、有关中国对日政策的几点思考

对中日两国来说，如何恰当地认识和定位双边关系，如何妥善地应对未和解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是艰巨而长久的挑战。对中日关系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以下仅从中国的角度谈几点粗浅的思考，希望有助于推动更深入的讨论。

第一，中国需要理性地认识自身的民族主义，在民意和对外政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对中国民众来说，关键是要更客观、更平衡地认识外部世界，避免诉诸简单化、情绪化的言行；对中国政府来说，关键是要将民意中的合理因素纳入外交决策，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待民意诉求，避免为了眼前利益迎合民意或为民意所左右。在这方面，提升外交决策的公开性、参与性可以作为有益的尝试。近年来，中国外交部已经通过广播、网络、微博、微信等一系列方式增进与普通民众的互动。长远来看，只有客观的信息和开放的讨论，才能形成理性的民意；只有形成理性的民意，才能使中国的对日政策在国内获得广泛而持久的支持。

第二，中国需要客观地评估变化中的日本政治。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最初20年里，日本国内既有务实地支持对华经济援助的政治和经济领导者，又有真诚地反省日本侵华历史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他们的对华态度在民众中拥有广泛共鸣。但是，这种情况在冷战后发生了变化。随着务实派和自由派人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日本政治正朝着更加保守的方向演化。在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压力下，日本政治中的这一倾向短期内不会改变。同时，在一个选民不信任政党和政府的时代，日本的政治领导人更可能诉诸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博取大众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将不得不寻找新的路径，和一个看起来不那么友好的日本打交道。在这方面，中日民间外交的传统可资借鉴。未来中日两国如果在政府层面一时难以达成全面的共识，那么不妨更多地推动社会层面的交往。毕竟日本政治精英中仍然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日本民间的对华态度更不是铁板一块，只有增加接触，才能准确地理解日本以及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

第三，中国需要全面地把握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趋势。中国崛起为地区乃至全球大国，日本走向“正常国家”，都是大势所趋。面对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迅速上升，日本等周边国家确实都心怀戒惧。这中间尽管包含很多误解和偏见，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威胁论”还难以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将长期存在。对于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加强军事部署和安全合作的举动，中国既要保持警惕，又不能多度解读为“围堵”中国，以免造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另一方面，中国应该看到，在日本的“正常国家”诉求背后，既有右倾保守势力的民族主义情结，又有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新的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的摸索，前者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破坏性，后者则体现了日本国内的某种共识。如果不加区分地反对，反而可能助长日本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中国还应该看到，尽管中美关系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日渐超越日美关系，但美日同盟仍然是美国东亚政策的基石，是美国维持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主导地位的关键，也是美国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政策工具。在此情况下，如果中日之间发生冲突或对抗，那么美、日以及其他一些亚

如果中日之间发生冲突或对抗，那么美、日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它们之间的安全关系，甚至制造亚洲版的北约，这样的地区格局必然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

洲国家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它们之间的安全关系，甚至制造亚洲版的北约，这样的地区格局必然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1] 因此，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仍然是冷静地观察和判断东亚国际格局的走向，若急于求成，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总之，中日两国的国内政治和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都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在过渡期中难免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摩擦和碰撞。关键是如何管控分歧，避免冲突或对抗。在认识和处理复杂的中日关系时，不能用情绪代替理性，也不能用道德判断代替事实判断。只有冷静下来，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为解决问题创造有利的条件。

1 薛理泰：《如何解读中日钓鱼岛争端》，凤凰网，2012年7月13日，http://news.ifeng.com/opinion/zhuanlan/xuelitai/detail_2012_07/13/16000439_0.shtml，2014年4月6日登录。